

政府更替对国际谈判的影响

郭 钢

www.cnki.net

一、导 言

国际谈判很少在完全信息或对称信息条件下进行。在对外关系中,各国都会对一些信息进行保密,也会经常故意传递错误信息。在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完全信息最通常的来源之一是政府的更替。新政府上台往往伴随着政策立场的重大转变。当国家之间就具有长期性的议题进行持久的谈判时,其中某个国家新政府的上台可能会导致谈判过程和结果的显著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同新政府谈判的国家可能往往对对手缺乏了解;另一方面,自身的偏好与特性却可能藉由过去的谈判过程成为双方都掌握的共同知识。这就是国家之间不完全信息的情况。通常,领导人的更替可能会引起将长期与之交往的一些国家的猜疑与不安,甚至在前者领导权的过渡完成以后,后者仍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新政府的真实政治姿态能够充分了解。

在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这种政府更替引起不对称信息的情况曾多次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苏联和西方列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新政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第86—107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权不太了解,采取了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例如,苏联驻华使馆追随国民党政权撤到广州。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边倒”的观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仍然留在南京,1949年8月他甚至一度准备访问北平。“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西方世界对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也知之甚少。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邀赴美进行了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领导人的更替也引起了各国政界、媒体、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猜测,“胡是谁?”的题目出现在不少报刊的醒目位置。当然,在中外关系中,最富戏剧性的应当是美国总统大选后新政府就职造成的不对称信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其四年一度的大选充满了巨大的悬念。在竞选过程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候选人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信号,真伪难辨,其中有些可能是为了取悦选民而开出的空头支票,另一些则是其一贯政策取向的反映。近几十年来,可以说每次美国新总统上台都会对中美两国的交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国际谈判中由于政府更替而引起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策略与行为特征,从而加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从研究方法上讲,由于数据获得方面的限制,对这个课题的经验研究还只能建立在个案的基础上。本文从美苏谈判的个案出发来进行研究。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超级大国之间的交互作用,持续时间之长、互动之频繁、对世界影响之大,以及材料之充足,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这使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为了寻求这类情况下的普遍规律以便把它推广到一般情况,本文借鉴了哈桑伊(John C. Harsanyi)^①把不完全信息转换成不完美信息的方法,从而构建一个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博弈模型。这一模型的基础是对1977年初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刚当选为美国总统时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分析。然后,笔者把这一理论模型推广应用到其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进行国际谈判的情形。本文最后则从不对称信息博弈的角度分析中美关系中的几个案例。

^① John C. Harsanyi, "Game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played by Bayesian players," *Management Science*, Vol. 14, (1967—1968), pp. 159—182, 320—334 and 486—502.

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背景

通过美苏谈判达成双边限制战略核武器库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和苏联做出的一系列姿态。但是,真正的谈判直到此后多年才开始。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延续了两年半。从1969年11月17日谈判开始,到1972年5月26日《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临时协议草案在莫斯科签署,美苏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先后进行了七次谈判。1972年11月,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在日内瓦开启了新一轮谈判,目标是对战略进攻性武器进行全面限制。两年后,美国总统福特(Gerald R. Ford)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在海参崴首脑会议上重申了“缔结一个有效期至1985年的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协议的意图”。美苏联合声明还包括以下约定:“基于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新协定将包括以下限制:A. 双方将有权拥有经同意的某一总数的战略运载工具……”

海参崴达成的共同谅解把上述“A”类中的总数的最高限额确定为2400件,而且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海参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上述“A”类包括轰炸机。^①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协议可以很快达成。

但是,大致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军事技术的革新带来了两个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导致谈判在1976年初逐渐停止。这两个问题是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的巡航导弹。简单地说,逆火式轰炸机是苏联的一种新型的具有战略潜力的中程轰炸机,美国试图把它包括在海参崴同意的2400件总数限额之内,而苏联对此加以拒绝。另一方面,巡航导弹是美国当时还在开发的一种实际上的“无人驾驶飞机”,它可以在各种基础上发射。苏联试图把它包括在战略运载工具内加以严格限制,但美国对此表示拒绝。根据加瑟弗(Raymond L. Garthoff)的说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行为造成这两个问题难以解决。基辛格促成了巡航导弹在1973年的试验和部署,而当时甚至军方对这些系统都不感

^①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77--1980*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1983), p. 898.

兴趣。基辛格允许苏联说海参崴的限额不包括逆火式轰炸机,但他又告诉美国军方和国会该轰炸机可以包括在限额之内,这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加棘手。^①

虽然面临着这些困难,基辛格于1976年初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次尝试仍然促成了“相当大的进展”。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最新提议表现出了兴趣。美国建议保留海参崴确定的2400件总数限额,其中不包括逆火式轰炸机而限制美国的巡航导弹。但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包括类似条件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后,福特总统断定,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下,“1976年内无法达成一个SALT协议”。

尽管如此,这时仍然可以肯定SALT协议已经“百分之九十完成了”。整个1976年,两国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继续在日内瓦就条约草案文本中争议较小的部分进行谈判。迟至1977年1月12日福特总统最后一次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他仍然相信一个基于海参崴协定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能够在年内达成”。一个星期以后,吉米·卡特宣誓就任美国的新一届总统。

三、不对称信息

卡特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苏联并不清楚美国新一届政府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偏好是什么。但是,美苏双方都真诚地相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在新总统领导下重新开始。过去8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都大致一贯地执行了政治上缓和的政策,所以卡特宣誓就职标志着1969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领导层的转变。从苏联的角度看,他们不能确定新一届政府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偏好,不知道它是大致延续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政治缓和,还是采取前几年在美国国内政坛出现的一种较为强硬的立场。卡特就职前后就此在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所给出的信号,是混杂甚至令人迷惑的。有时候,他似乎要采取强硬而积极的立场,限制美苏两国的核武器库并要求苏联对其战略能力进行更具实质性的削减。在1976年的竞选过程中,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批评福特总统:“缓和政策对俄国

^①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 600.

人让步太多,我们得到的太少。”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说美国在缓和的过程中应该“更强硬一些”^①。在197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卡特向世界宣布了他雄心勃勃的“最终目标:从这个地球上消除所有的核武器”。卡特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R. Vance)观察到,“苏联人面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安,卡特这次广泛宣扬急剧削减核武器的愿望让他们担忧,他们不能确定卡特对缓和的意图到底是什么”^②。

但是,在其他场合,卡特发表的一些言论使人们感到他似乎会继续政治缓和的道路,并按照前一届政府的方式在海参崴协定的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评述说,卡特“进入白宫……坚定地支持缓和的观念”^③。卡特总统就职一个星期后就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出一封私人信件。在信中,他强调说,“我的目标是同苏联改善关系”,而且“向此目标可以取得进展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就是迅速结束限制战略武器谈判。^④1977年2月8日,卡特总统在华盛顿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如果苏联认为可行的话,我愿意跟他们迅速缔结一个协定,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暂不讨论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⑤后来,他又明确表示:“我现在赞成同苏联缓和。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向和平的进展。”^⑥据卡特回忆,在就职时他觉得自己“会遵循前任总统们开辟的道路”^⑦。所以,当新一届美国政府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向苏联发出最初的提议时,苏联领导人并不清楚美国方面对谈判的偏好结构是什么。

与苏联方面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偏好的不确定形成对照的是,对于美国人而言,苏联领导人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下台以来,苏联只有一个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领导层。更重

^①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 624.

^② Cyrus Roberts Vance,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46.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 147.

^④ Ibid., p. 152.

^⑤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77—1980*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1983), p. 154.

^⑥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 624.

^⑦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 215.

要的是,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已经与勃列日涅夫政府进行了多年的谈判,美方已经能够很清楚地了解苏联方面在限制战略武器上的偏好结构。美国已经向苏联尝试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提议,而苏联的回应基本在指导方针上是一致的。卡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同一个政策比较一贯的集权主义国家谈判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要容易得多。那里新闻媒体和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声音要么被平息,要么只有关起门来才能听到。政治局……可以决策,然后国家宣传机构就宣称‘一致同意’国防必需的新政策。”^①因此,当1977年初美苏谈判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苏联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立场视为双方的共同知识。

四、美苏双方的偏好排序

(一) 从苏联角度看美国可能的偏好排序

从苏联的角度看,在通过实际谈判交流过程使事情变得明朗以前,新一届美国政府既可能是“强硬”型的,也可能是“缓和”型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类型的名称只是在构建博弈模型时所进行的必要的简化,它们代表的是美国效用的两种不同的排序,而不是代表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根本取向,所以不能等同于外交与新闻的词汇。本文的博弈模型试图解释的是新政府上台后第一次谈判中不对称信息的情况,所以博弈只进行一轮就结束了。在以后的谈判中,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数学模型也可以无限复杂化,但它们背后的基本逻辑可以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加以说明。

“强硬”型的新一届政府最希望以“消除所有核武器这一最终目标”的名义急剧而全面地削减苏联的核武器库。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在1977年2月3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特别协调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总统强调了他支持大幅度削减的态度,现在所有的负责人都熟悉这一立场”^②。万斯也暗示:“内阁里的其他人考虑到,为了我们长期的武器控制和安全目标,值得进行一次冒险去

^①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 213.

^②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157.

施压要求大幅度削减并从性能上限制武器现代化,所以辩论的结果是赞成全面大幅度削减的方法。”^①除了这一大幅度削减以外,在当时的谈判僵局之下,“强硬”型的美国政府不会优先选择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所以,与缓和的政府不同,“强硬”型的美国政府不会期望就核裁军早日达成协议,以便在美苏之间形成更好的政治气氛。加瑟弗评论说,卡特并没有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其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②从苏联的角度看,一个“强硬”型的美国政府会宁愿继续维持僵局,也不会倾向于任何基于海参崴协定框架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相反,如果新政府是支持缓和的,它最感兴趣的就会是迅速达成一个有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缓和”型的美国政府会跟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政府的偏好结构类似。前政府相信:“我们想在一个协议里勉强塞进的东西越多,谈判所花的时间就越长;谈判拉得越久,(军备)竞赛加剧的危险就越大,而那正是我们寻求避免的。”^③在1977年初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这一偏好意味着一个不包括引起争议的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那正是卡特总统在2月谈判开始以前告诉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

一个以缓和的方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政府最想要的结果是迅速缔约。此外,与当时的僵局相比较,它也愿意争取缔结一项把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都包括在总数限额里的协定。另外,与不达成任何协定相比较,这样一个政府会倾向于全面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万斯解释说:“我原则上并不赞同全面(削减)的途径。从长远观点看,这显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苏联人也许……会愿意采取大胆的步骤。我们不试一下是不会知道的。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在防止军备竞赛上取得一次戏剧性地突破。”^④因此很明显,对于主张缓和的美国政府来说,一个进行全面大幅度削减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如果能够实现,它将好于维持现状。甚至基辛格也相信:“如果苏联人真诚地要在裁军上

① Vance, *Hard Choices*, p. 48.

②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 625.

③ Fred C. Iklé, “Hearing on the Vladivostok Accord, 8 July 1975,” in Roger P. Labrie, ed., *SALT Handbook: Key Documents and Issues 1972—1979*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9), p. 325.

④ Vance, *Hard Choices*, p. 49.

取得进展的话,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上商定的大幅度削减的提议很有可能被他们接受。”^①

(二) 苏联的偏好排序和“模棱两可”的结果

从1972年以来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过程看,显然苏联人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基于他们所理解的海参崴谅解达成协议。这一结果的基本要点是:执行2400件战略运载工具的总数限额,苏联逆火式轰炸机不包括在限额内,对美国巡航导弹的试验和部署加以限制。苏联最不希望的结果是全面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库。

对这两个结果,苏联的偏好排序是明显的。但是,还存在第三种SALT协议,其含义对苏联来说是模棱两可的,其有利与否取决于美国新政府的“类型”。这一种协议既不把逆火式轰炸机也不把巡航导弹包括在总数限额之内。苏联不清楚它未来要交道的美国政府是哪种类型,而这会影响苏联对这一协议的偏好。如果美国新政府遵循缓和的道路,那么不包括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有助于开辟美苏缓和的政治大气候。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结果会比维持现状或不达成协议都要好。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新政府是强硬型的,那么从苏联的角度看,对美国巡航导弹不加限制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来会给苏联带来麻烦。在这一情形下,强硬的美国政府会更看重与苏联的竞争而不是合作。而两国之间恶化的政治局面会使苏联不希望达成这样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布热津斯基说,在这样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他看到“一个机会可以停止或者减少苏联军事集结的动力”^②。如果苏联要面对这样一个美国政府,那它就宁愿维持现在的僵局,而不愿意在未来4—8年中,与一个强硬的美国政府竞争和对抗时被这一协议束缚手脚。因此,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苏联对同样的结果有不同的效用,而这取决于美国政府的类型,即使美国和苏联达成相同的协议且被严格执行,情况都是如此。

^① 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9.

^②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146.

五、博弈模型的结构

下面,笔者对1977年3月美苏之间第一回合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构造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首先说明每个行为者(美国和苏联)行动的次序和在每一个节点可能的行动集合。

(一) 行动的次序和行动集合

在第一回合,美国政府先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向苏联提出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用 V (海参崴英文“Vladivostok”的第一个字母)来表示,是一个基于海参崴框架的提议,包括三个要点:战略运载工具的总数限制在海参崴所达成的2400件;提及逆火式轰炸机但实质上不把它包括在限额内;限制美国的巡航导弹。这个提议是最通融的,对苏联也是最有利的。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说法,这也是国务院和武器控制和裁军署支持的提议。^①

第二个提议用 V_p (“Vladivostok plus”的缩略语)来表示,是全面大幅度削减的建议,也包括三个要点:把在海参崴同意的总数限额降低到大约2000甚至更低;不包括逆火式轰炸机,但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保证不提高它的战略能力;部分限制美国巡航导弹。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说法,这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最支持的方案^②,也是苏联方面最不希望的方案。

第三个提议用 V_m (“Vladivostok minus”的缩略语)来表示。这个提议如果成为协议,对苏联来说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这个方案建议双方迅速达成一个有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把有争议的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问题推迟到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美国政府发出提议后,苏联看到美国的行动并决定是否接受。如果苏联拒绝,那么结局就是维持现状(SQ)。

^①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158.

^② Ibid.

(二) 不完全信息

在这一轮谈判中,如上所述苏联对美国新政府的类型并不清楚。苏联也不能确定,从海参崴框架中排除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协议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美国新政府是“强硬”型,那么这一博弈的对策形式就如表-1 所示:

表-1 “强硬”型美国政府与苏联的博弈

		苏联	
		接受	不接受
“强硬”型 美国政府	V_m	$U_2(V_m), U_1(V_m)$	$U_2(SQ), U_1(SQ)$
	V	$U_2(V), U_1(V)$	$U_2(SQ), U_1(SQ)$
	V_p	$U_2(V_p), U_1(V_p)$	$U_2(SQ), U_1(SQ)$

如果美国新政府遵循缓和的路线,那么这一博弈的对策形式就变成:

表-2 “缓和”型美国政府与苏联的博弈

		苏联	
		接受	不接受
“缓和”型 美国政府	V_m	$U'_2(V_m), U'_1(V_m)$	$U_2(SQ), U_1(SQ)$
	V	$U_2(V), U'_1(V)$	$U_2(SQ), U_1(SQ)$
	V_p	$U_2(V_p), U'_1(V_p)$	$U_2(SQ), U_1(SQ)$

根据“哈桑伊转换”,通过把自然选择作为最初的行动,不完全信息博弈可以转化为不完美信息博弈。自然首先选择美国新政府是强硬型还是缓和型。美国可以观察到这一最初的行动,但苏联无法观察这一最初的行动。用先验概率 p 表示苏联认为自然选择“强硬”型美国政府的可能性。在博弈的第二步,美国从上述的三个行动中选择一个: V_m 、 V 和 V_p 。苏联观察到美国的行动,但是不知道它面对的美国政府的类型,所以在图-1 中的展开型博弈中有三个信息集,用虚线表示。

图-1 的展开型博弈中,在三个信息集中的每一个里面,苏联选择是否接受美国的提议。如果苏联不接受,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假定两个行动者对维持现状的效用都是 0。

如果苏联接受提议 V_m , 结果就是 V_m 成为协议, “强硬”型美国政府和“缓和”型美国政府对这一结果的效用分别用 M_1 和 M'_1 表示。对苏联来说, 如果它面对的是“强硬”型美国政府, 那么它对 V_m 的效用就用 M_2 表示; 如果它面对的是“缓和”型美国政府, 那么它对 V_m 的效用就用 M'_2 表示。根据前述美国和苏联的偏好排序, 有: $M_1 < 0 < M'_1$ 且 $M_2 < 0 < M'_2$ 。

如果苏联接受提议 V , 结果就是 V 成为协议。“强硬”型美国政府、“缓和”型美国政府和苏联对这一结果的效用分别用 V_1 、 V'_1 和 V_2 表示。根据前述美国和苏联的偏好排序, 有: $V_1 < 0 < V'_1$, 而且 $V_2 > M'_2 > 0 > M_2$ 。

如果苏联接受提议 V_p , 结果就是 V_p 成为协议。“强硬”型美国政府、“缓和”型美国政府和苏联对这一结果的效用分别用 P_1 、 P'_1 和 P_2 表示。根据前述美国和苏联的偏好排序, P_1 和 P'_1 都大于 0, P_2 小于 0。两个行为者对各种可能结果的效用排序如表-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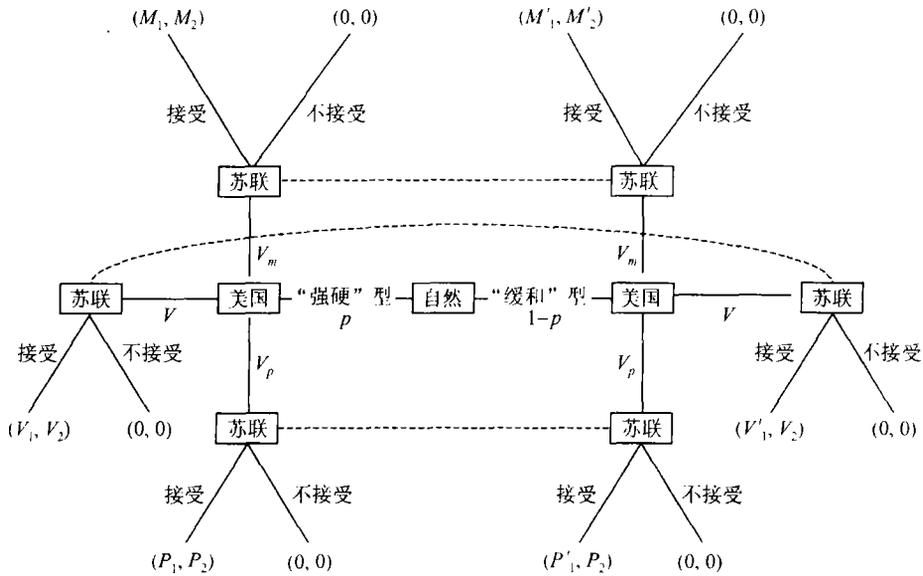


图-1 1977年初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博弈模型的展开式

表-3 博弈模型中美国和苏联对四种可能结果的效用排序

	如果美国政府是“强硬”型	如果美国政府是“缓和”型
美国的效用排序	$P_1 > 0 > M_1 > V_1$	$M'_1 > V'_1 > P'_1 > 0$
苏联的效用排序	$V_2 > 0 > M_2 > P_2$	$V_2 > M'_2 > 0 > P_2$

六、精炼贝叶斯均衡

这个博弈模型的基本特征类似于一个信号博弈,即同时包括更新和精炼的博弈中最简单的一种。^① 在信号博弈中,精炼贝叶斯均衡是一个对策和信念的集合,使得在这个博弈的任何一个阶段,给定这些信念,对策就是最优的。这些信念是用贝叶斯法则得到的。

首先,有几个对策是严格劣策略,可以被排除。不管面对的美国政府是哪种类型,苏联都不会拒绝美国提出的 V ,也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 V_p 。因此,“强硬”型美国政府绝不会提出 V ,“缓和”型美国政府绝不会提出 V_p 。

其次,对各种信念表示如下。用 μ_m 表示当苏联观察到美国提议 V_m 时,它相信美国政府是“强硬”型政府的可能性。用 μ 表示当苏联观察到美国提议 V 时,它相信美国政府是“强硬”型政府的可能性。用 μ_p 表示当苏联观察到美国提议 V_p 时,它相信美国政府是“强硬”型政府的可能性。

考察效用结构和每一个剔除后剩余的策略和信念集合后,可以找到三个精炼贝叶斯均衡,它们都是分离均衡,即不同类型的美国政府会选择两种不同的行动。

首先考虑以下的策略形式。“强硬”型美国政府提出 V_m ,“缓和”型美国政府提出 V 。苏联毫无例外地接受 V ,拒绝 V_p 。如果苏联观察到 V_m ,贝叶斯更新赋予美国政府是“强硬”型的概率为 1,所以苏联的均衡策略是“如果是 V_m ,就不接受”。

其次考虑如下策略形式。“强硬”型美国政府提出 V_p ,“缓和”型提出 V_m 。

^① Drew Fudenberg and Jean Tirole,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1), p. 324.

苏联毫无例外地接受 V , 拒绝 V_p 。如果苏联观察到 V_m , 贝叶斯更新赋予美国政府是“缓和”型的概率为 1, 所以苏联的均衡策略是“如果是 V_m , 就接受”。

第三, 考虑以下的策略形式。“强硬”型美国政府提出 V_p , “缓和”型美国政府提出 V 。苏联毫无例外地接受 V , 拒绝 V_p 。如果苏联观察到 V_m , 它的信念 μ_m 是在均衡路径之外, 所以不能用贝叶斯法则来更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 V_m , 就接受”不可能是苏联的均衡策略, 因为如果苏联采用“如果是 V_m , 就接受”的策略, 那么“缓和”型美国政府宁愿提出 V_m 而不是 V 。所以剩下惟一的

苏联的均衡策略是“如果是 V_m , 就不接受”。当 $\mu_m > \frac{M_2'}{M_2' - M_2}$ 时, 第三个精炼贝叶斯均衡是, “强硬”型美国政府提出 V_p , “缓和”型美国政府提出 V , 苏联接受 V , 不接受 V_p 或者 V_m 。!

前两个精炼贝叶斯均衡都包含着既定偏好结构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 V_m 。 V_m 如果被接受, 对苏联来说是模棱两可的一个结果。所以, 当苏联观察到 V_m , 它就能确定所打交道的美国政府的类型。第三个精炼贝叶斯均衡更加有趣, 因为模棱两可的结果使 V_m 不在均衡路径上。在这个均衡中, 苏联拒绝 V_m 的前景避免了“缓和”型美国政府偏离均衡去提出它最希望实现的 V_m 提议。对“强硬”型美国政府来说, 它所希望得到的最好的报酬是 0, 因为 V_p 肯定不会被苏联接受。所以, 苏联的行动并不改变“强硬”型美国政府的最优反应。信念(即 μ_m) 要大于某个分界点, 说明苏联只有在它对美国政府是“强硬”型的信念足够强时才会拒绝 V_m 。信念 μ_m 不能从贝叶斯法则推导出来, 在实际中它可能源自任何地方。但比较合理的猜测是, 它可能与苏联的先验概率 p 有关。

J. 如果下列条件满足, 那么对苏联来说, “如果是 V_m , 就不接受”相较于“如果是 V_m , 就接受”为更优的反应:

$$EU_2(\text{如果是 } V_m \text{ 就接受}) < EU_2(\text{如果是 } V_m \text{ 就不接受})$$

$$M_2 * \mu_m + M_2' * (1 - \mu_m) < 0 * \mu_m + 0 * (1 - \mu_m)$$

$$\text{从而, } \mu_m > \frac{M_2'}{M_2' - M_2}$$

七、美苏博弈的历史演进

现在来考察一下美苏之间的不对称信息博弈在1977年3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目的是增进对精炼贝叶斯均衡策略和信念的了解。

美国方面的提议是在1977年2月至3月SALT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形成的。在国务卿万斯3月底前往莫斯科以前,卡特总统给他的指示说首选的提议是大幅度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强调说“苏联人可能会拒绝并嘲笑我们的提议”^①。3月28日,谈判在克里姆林宫开始,美国提出两个提议,并且解释说首选的提议是全面大幅度削减(即博弈模型里的行动 V_p),另一个提议是“推迟”的提议(即博弈模型里的行动 V_m)。我在模型中把美国的行动作为一个提议而不是两个绑在一起,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双方谈判开始前美国会提出两个方案并不是常识;第二,虽然两个提议是一起提出的,但双方对这两个提议是独立加以考虑的,就好像它们是单独提出的一样。而且, V_m 放在里面显然是做样子的。

苏联拒绝 V_p 的方式很有戏剧性。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重击讲台,称美国的方案是“低级而可疑的花招”^②。很明显,这里实际出现的均衡是上面所述的第三个精炼贝叶斯均衡:“强硬”型美国政府提出 V_p ,被苏联拒绝。 V_m 不在均衡路径上,苏联人看到就拒绝了。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苏联相信美国政府是强硬型的信念 μ_m 是足够高的。从历史纪录来看,苏联的预感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卡特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③,二是卡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全面裁军提议的发言。^④但是,如前所述,当谈判开始时苏联仍然不确定美国新政府的类型。

①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160.

② Ibid., p. 164.

③ Ibid., p. 161.

④ Vance, *Hard Choices*, p. 53.

八、模型的推广

虽然这一不对称、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包含了相当详尽的历史细节,但它完全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由于政府更替而形成不对称信息的一般情况。这个博弈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在博弈的开始,一国政府不能确定另一国新政府的效用结构。当该国政府考虑它将来与新政府的互动时,同一个结果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这取决于它将面对的新政府的类型。因此,只需对本文中的博弈模型做一些必要的改动,就可以推广应用到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新政府互动时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类似案例。

在新的一般化模型中,自然要在最初的节点选择新政府(或者称1号行动者)的类型,即1号行动者究竟是“友好”型还是“不友好”型。自然选择“友好”型政府的先验概率是两个行动者的共同知识。然后两种类型的新政府从三种可能的行动中选择一个:“调和”、“掠夺”或者“模棱两可”。前两种行动的名字是从非常简化了的Kreps-Wilson-Milgrom-Roberts两周期声誉博弈模型里借用过来的。这个模型被弗登堡(Drew Fudenberg)和蒂罗勒(Jean Tirole)用作信号博弈的一个简单的例子。¹新政府的手(或者称2号行动者)观察到1号行动者的行动,但是不知道它面对的1号行动者的类型,所以1号行动者的三个行动之后各有一个信息集合。2号行动者可以接受或者拒绝提议。如果它拒绝,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如果它接受“调和”、“掠夺”或者“模棱两可”,结局就分别是这三种情形。如果2号行动者面对的是“友好”型的1号行动者,那么同维持现状相比它会更偏好“模棱两可”。但是如果2号行动者面对的是“不友好”型的1号行动者,那么同“模棱两可”相比它更偏好维持现状。这个一般化的博弈模型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举例如下。

(一) 1954年苏联和西方就德国统一的谈判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在克里姆林宫

1. Fudenberg and Tirole, *Game Theory*, p. 326.

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之后,赫鲁晓夫上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这时,西方并不能确定苏联新的领导人的类型。他们真正地希望(实际上也有某种迹象表明)新领导人会脱离斯大林的老一套做法,转而对西方采取调和的做法。但是,1953年6月东德起义被迅速镇压,说明新的领导人也许和斯大林一样严厉。所以,当1954年初四大国关于德国统一的会议开始时,苏联和西方处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情况。至于可能行为的集合,根据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说法,苏联可以从德国统一的三个提议中选择一个:斯大林1952年3月的提议、贝利亚(Lavrenti Beria)1953年5月的方案,或者一个更坚持己见的提议。^①这其中贝利亚的方案显然是“调和”的提议,更坚持己见的提议可归为“掠夺”,而斯大林的提议则是“模棱两可”的行动。贝利亚的方案要求德国统一并中立,而“是否社会主义并不重要”。该方案还要求西德向苏联支付大量赔款,而让东德在统一的德国内降格至某种从属地位。这个方案如果实现,当然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结局,但是“不友好”型的苏联领导人绝不会提出这一方案。另一方面,坚持己见的提议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采取严厉得多的立场,要求西方军队撤出德国。这是对苏联最有利的结局,但不可能实现,因为不管苏联领导人是否是“友好”型,西方都不会接受这个提议。斯大林的提议要求召开四大国会议,安排整个德国的自由选举,然后建立一个独立的、重新统一的、重新武装的但是中立的国家。这就是“模棱两可”的提议,因为这是从东方的实力角度出发把苏联的影响力扩大到西德。^②如果西方要在未来10到20年时间里与一个“友好”型的苏联领导人打交道,那么这样一个结局比维持现状要好,因为从长远来看它将在欧洲产生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如果苏联领导人属于“不友好”型,这一结局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把这一统一的并且重新武装的德国变成欧洲一个不稳定的来源。因此,根据以上推导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如果西方观察到“模棱两可”的提议后相信苏联领导人是“不友好”型的信念足够强,那么他们看到这个提议就会拒绝。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p. 133.

^② *Ibid.*, p. 134.

在这个博弈的实际历史进行中,苏联采取了“掠夺”的行动。在四大国会议上,苏联的提议非常固执己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说:“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关于德国的提议如此极端,实质上是要求全德国的苏维埃化和美英法军队撤出德国。我们相信他提出的不妥协的提议大大加强了西方的立场。”^①另一方面,正如加迪斯指出的,“要是俄国人在这个时候重提斯大林1952年3月的提议”,西方也许会接受。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实际发生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同本文前面推导的第二种均衡类似,即“友好”型的1号行动者提出“掠夺”,“不友好”型的1号行动者提出“模棱两可”,2号行动者拒绝“掠夺”而接受“模棱两可”。

(二) 中美互动中的不对称信息博弈

本文首先基于1977年初美国政府更替后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构建了一个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然后用1954年初苏联领导人更替后与西方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的例子表明,这一模型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到同新政府进行策略互动的类似案例。这两个例子证明,用简单模型分析的结果与现实大致相符。这一博弈模型还可以有更多发展的空间。例如,两个行动者的时间视野对均衡有何影响就值得研究,因为这一模型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2号行动者对将来与某种类型的1号行动者互动的期望值影响它对“模棱两可”的结局所做的计算。对更多可以归入不对称信息博弈类型的历史案例进行研究,也会对我们的理解有帮助。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考虑,我们都很有必要再详细回顾和分析一下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不对称信息博弈的案例。

正如导言中所述,中外关系中尤以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和新政府就职引起的不对称信息最富有戏剧性。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美国一共经历了10次总统更替,如下表所示。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p. 134.

表-4 1949年以来的美国总统更替

年份	新总统	更替方式	新总统党派	是否党派更替
1953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大选	共和党	是
1961	约翰·肯尼迪	大选	民主党	是
1963	林登·约翰逊	副总统接任	民主党	否
1969	理查德·尼克松	大选	共和党	是
1974	杰拉尔德·福特	副总统接任	共和党	否
1977	吉米·卡特	大选	民主党	是
1981	罗纳德·里根	大选	共和党	是
1989	乔治·布什	大选	共和党	否
1993	威廉·克林顿	大选	民主党	是
2001	乔治·W. 布什	大选	共和党	是

这10次总统更替中,1963年和1974年的两次是由于原总统被刺或辞职而由原副总统接任,没有经过大选,所以前后政府的对外政策相对比较一致,信息的不对称并不是很明显。1989年乔治·布什(George Bush)接替里根(Ronald Regan)总统虽然经过大选,但两人同属共和党,乔治·布什更是原里根政府的副总统,所以那次的新政府就职没有太多悬念。剩下的7次政府更替都是由原在野党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而入主白宫。由于这7位总统在就职时都是来自至少4年没有执政的政党,在对外关系上既没有经验又缺乏前政府的必要合作,所以不仅给他们自己的外交施政造成重重困难,而且对与他们打交道的外国政府来讲也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1969年离任时,把重要的外交文件和录音带都带到了远在得克萨斯的总统图书馆,没有留给共和党的新总统尼克松。而当民主党的卡特总统1977年入主白宫时,也找不到前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重要外交谈判的纪录,甚至不知道他们关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① 用泰勒(Patrick Tyler)的话来讲:“华盛顿的政府更替,尤其是一个政党赶走另一个政党的情况,就像野餐时突降雷阵雨,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惊慌失措。”^②

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眼中美国新总统的政府可以简化为两种类型之一,借用前述一般化模型中的用法,不妨称之为“友好”型和“不友好”型。“友好”型的美国政府更加看重中美关系中的长期合作和战略利益,而“不友好”型的美国政府则更多地从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考虑希望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再次指出的是,这里所用的名称只是构筑模型的需要,并不

①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 237.

② Ibid., p. 230.

一定与实际外交场合和新闻媒体所用的语言有同样的含义。在中美之间的实际互动中,美国新政府的类型往往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可以在模型中简化为自然的选择,用先验概率赋值。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本文不可能对上述的新总统和党派更替造成的不对称信息博弈的7个案例一一求解,但至少我们可以看看双方处于不对称信息情况下谈判时的偏好、策略与行动。以下简单讨论两个案例,一个是1977年卡特总统就职后中美之间就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第一次谈判,另一个是1981年里根总统就职后中美之间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的第一次谈判。

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就一直是两国之间的重要议题。但是,围绕美台关系的争议和两国内政的干扰使得谈判旷日持久,在福特总统任内更是山重水复,以至于到了1976年基辛格还觉得“正常化是不可能的”^①。但在1976年底的总统大选中,福特被吉米·卡特击败,这为中美关系实现突破带来了转机。卡特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外交动作就是上面博弈模型里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而争取《巴拿马运河条约》在参议院能够通过也耗费了他部分精力,所以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被放到了新政府的次要考虑上。更麻烦的是,新政府内阁中的对华政策分歧很大。从卡特、万斯等人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国务卿万斯为首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间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上意见不一。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对苏强硬派希望尽快利用与中国的谈判来向苏联施加压力,而万斯则把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放在更优先考虑的地位。从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的角度看,这两派力量正好代表了美国新政府的两种可能的类型,其主要区别是在对通过让步尽快与中国建交和继续当时中美关系僵局的两种相对效用的比较上。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卡特新政府内的这些对外政策上的权力斗争及其结果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政府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偏好早已成为双方的共同知识。所以,此时的中美第一次谈判,具有不对称信息博弈的基本特征。1977年6月,卡特总统终于下决心接受中国一直坚持的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三原则。但是,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他也希望在与中国的谈判中保证台湾的安全和某种程度上与台湾的官方关系。8

^① Henry Kissing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Senior Staff Members (Secret)*, October 29, 1976.

月22日,国务卿万斯来到北京,先后受到了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邓小平副主席的接见。在24日万斯和邓小平的会见中,万斯提出了美国的提议。其要点是,除了三原则以外,中国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把在北京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把在台北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一要求被邓小平当场断然拒绝。在这第一回合的交锋中,美国新政府的提议明显是一个前述一般化博弈模型中的“掠夺”行动,使中方能够更新其对美国新政府(或者是万斯本人)是“不友好”型的信念,并采取拒绝的均衡策略。到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谈判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1980年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吉米·卡特,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这次总统和党派的更替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来讲其实悬念反而并不大。里根是共和党内老牌的政治人物,经过多次竞选和地方执政后,其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早已尽人皆知。但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尤其是在美中关系中关键的台湾问题上,里根在就任总统以前所发出的信号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例如,1976年里根争取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就批评当时的福特总统不够注意北京,造成中美关系的发展停滞不前。^①到1978年12月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里根又指责总统向北京“投降”。1980年竞选的时候,里根一边特意派他的竞选伙伴乔治·布什去北京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一边又在各种场合反复宣称要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虽然里根在就任总统以后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美台关系的性质,甚至连原定邀请国民党和台湾代表参加他的就职仪式的计划也被临时取消,但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对里根的各种疑虑和不确定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哈丁(Harry Harding)所说,里根就任总统“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②。与中国政府对美国新政府的不确定性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政府经过从尼克松以来与中国政府的多次谈判,早已熟悉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政策主张。所以,从博弈模型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的偏好排序应该可以被视为双方的共同知识。

里根新政府上台后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① Ronald Reagan, "Expanding Our Ties with China,"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76, p. 31.

^②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p. 108.

当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现状是,中美 1978 年底的建交谈判未能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但是,根据美国国会 1979 年初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第三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只由美国总统和国会依照美国国内法决定,不受其他任何限制。很明显,这样一种现状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其相对效用取决于美国新政府的类型。如果美国新政府是“友好”型的,那么就会从中美关系和世界均势考虑而主动克制以免影响大局。如果美国政府是“不友好”型的,那么就宁愿维持相对不受约束的现状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协议。对中国政府来讲,如果美国新政府是“友好”型的,那么维持现状也并非不可接受的结局。在 1978 年底中美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这样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纠缠不休,只是发表声明反对。这说明,当时中国政府相信美国政府是“友好”型的信念是比较高的。从布热津斯基彼时对中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这样的信念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美国新政府是“不友好”型的,那么就会利用对台军售不受约束的现状不时挑战中国政府的忍耐性,造成无穷后患。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更好的结局应该是与美国新政府达成一项协议,让美国新政府做出一定的承诺和保证。从当时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荷兰 1980 年 11 月决定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以及里根在竞选前后要坚持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也给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因为这些情况暗示,当面对“不友好”型的美国新政府时,维持现状可能并不是最优的结局。正如邓小平在 1981 年 1 月 11 日明确指出的:

“对美斗争首先是台湾问题,荷兰于去年 11 月决定售给台湾两艘潜艇,显然是效法美国,而且有发展。在这件事上,美国是罪魁祸首,不能不同它斗争。而且,问题还不仅仅在售台武器上。从里根的言论看,他可能要全面发展美台关系,邀蒋彦士就是一个信号。……我方以外交降格同荷兰作斗争;同美国斗,也必须不惜关系倒退。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现在决心要放在后退到 1973 年联络处的时候,甚至退到 1972 年以前,也就是尼克松访华以前。我们要经过曲折之后,保持原来的中美关系。归根到底,只要我们这样做,最后他(指里根)还得来”。¹

¹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HIAW/109139.htm>, accessed February 20, 2005.

美国此时向中国的提议可以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提议是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或者至少制定一个在将来逐步停止军售的时间表。这个提议如果成为博弈的结局,当然是中国政府最为希望的,也远远优于当时的现状。但是,对“不友好”型的美国政府而言,这是最糟糕的结局。第二种提议是以中国政府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件。从尼克松开始的历届美国政府就希望中国政府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邓小平在1979年1月5日对美国记者表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第三种提议是搁置以上两个争议,但双方签订一个指导原则性的公报。从中美最后签订的《八一七公报》来看,中国没有承诺放弃武力,美国也没有放弃军售。但是,它避免了在一个“不友好”型的美国新政府下维持现状的结局。

九、结 论

本文就国际谈判中其中一国发生政府更替的情况构建了一个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博弈模型。在国际关系中,很多谈判是旷日持久,都是因双方的偏好排序早已成为常识,所以博弈模型常常以完整信息为前提。但是,一方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谈判则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外。这种谈判在国际关系中是极为常见的,很值得研究。对手所处信息集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博弈的均衡策略有着根本的不同。本文提到的最明显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政府从某个“模棱两可”的结局中所获得的相对报酬取决于其谈判对手的类型,即新政府的类型。就中美关系来讲,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尤其是政党更替的情况,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又常常有外交内政上的分歧。从以上博弈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与新政府第一次谈判的结果,这种不确定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解与新政府谈判的特殊性,有助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政府更迭后的谈判中达成共识。

作者简介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1992年)。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1年),译著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2003年)。

电子信箱:yanxt@mail.tsinghua.edu.cn

江忆恩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1993年)。研究兴趣为国际制度、身份认同和战略文化。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1995)。

电子信箱:johnston@fas.harvard.edu

朱毓朝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皇后大学政治学博士(1996年)。曾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中国研究》(日本)、《二十一世纪》、《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以及 *Issues and Studies*,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Review*,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电子信箱:yuchao.zhu@uregina.ca

郭钢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2002年)。1997年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2001年获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东亚政治、比较政党和政治统计分析。

电子信箱:gg@olemiss.edu

周宝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2003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毕业。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电子信箱:zb04@mails.tsinghua.edu.cn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博士(1994年)。著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8年),译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年)、《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2003年)等。

电子信箱:yqqin@cfau.edu.cn